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明代“众寡分合”作战思想及其实践运用

葛业文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北京 100091)

摘要:“众寡分合”即兵力的使用与部署问题,它是作战的基本问题,也是孙子兵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明人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戚继光、俞大猷等为代表的军事将领还通过实战对分合之变、众寡之用加以生动诠释。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

关键词:明代;众寡;分合;兵力;作战;孙子兵学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1.006

《孙子兵法·军争篇》云:“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所谓“分合”(或称“专分”),就是指兵力的集中与分散,这是用兵作战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古代兵家历来高度重视和探讨较多的兵学范畴之一。“分合”往往又与兵力的“众寡”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孙子以来的历代兵家在此问题上论述颇多。明代兵家和论兵之士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分合之变”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众寡之用”问题继续予以阐发,戚继光、俞大猷、沈希仪等将领更是在实战中正确把握分合之宜,灵活机动调度兵力,以此夺取作战的胜利。

一、明以前兵家有关“众寡分合”问题的基本认识

集中己方兵力,分散敌方兵力,在主要战场和主要方向占据绝对的优势,是中国古代兵家共同推崇的基本作战原则。《孙子兵法》最早明确提出这一作战原则,认为在敌我兵力相对均势的条件下,要创造出优势的局面,就必须善于集中己方兵力,而使敌方兵力分散,“我专为一,敌分

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1]12}。并且提出了把握分合之变和众寡之用的一般标准是“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1]5}。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司马法》则更进一步阐述了兵力众寡不同条件下的作战特点与要求。它认为,作战的通常规律是“用寡固,用众治”,即动用较少的兵力作战,要注重营阵防守坚固;使用较多的兵力作战,必须讲求部队管理整治有序。“寡利烦,众利正”,兵力弱小利于战术多变出奇制胜,兵力强大利于摆开堂堂正正之阵与敌正面交战。基于此,它提出“分合之变、众寡之用”的原则和标准为“众以合寡,则运裹而阙之,若分而迭击。寡以待众,若众疑之,则自用之”^{[2]80-81}。

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兵略训》承继孙子的思想,从兵力集中与分散各自的效用角度论述了“众寡分合”问题,并强调指出:“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镞铍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3]46}。到了北宋,兵家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何去非所著的《何博士备论》和无名氏编撰的《百战奇法》两部兵书,不仅

收稿日期:2022-12-15

作者简介:葛业文(1974—),男,安徽肥东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E-mail:cogitoego@sina.com

阐明了集中与分散兵力的普遍性原则,认为“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异分”^{[4]526}，“凡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而且注意区分敌我众寡强弱不同情况,明确提出不同情况下集中与分散兵力的具体做法,如“若我兵分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5]189}，“若我众敌寡,当择平易宽广之地以胜之。若五倍于敌,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三倍于敌,二术为正,一术为奇。所谓一以当其前,一以攻其后”^{[5]187}。何去非还主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即使己方兵力寡少,也要分兵击敌,如“项羽之二十八骑,而分之四,会之为三”,这是因为“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4]527}。

由上可见,明以前历代兵家对“众寡分合”问题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原则到具体细化的过程,相关论述渐趋繁富,这也为明人沿此问题继续研究阐发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学术基础。

二、明人对“众寡分合”问题的理论阐发

明人对分合之变的探讨,同样与众寡之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方面的认识较前人则更加细化具体,也更充分深入。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以《草庐经略》《阵纪》《兵录》等为代表的兵学专著中。

《草庐经略》专辟两个篇章,详细阐述众寡分合思想。它首先讨论了“用众”问题,认为作为将帅,将人数众多的部队集中在一起作战并不难,难在如何使用这些兵力,如果不善于“用众”就会导致失败。它强调“用众之道,宜易地,宜整治,宜持重,宜分拆”^{[6]125}。所谓“分拆”,就是分散兵力,即在适宜的条件下,要懂得将众多兵力分散为用途不同的几个部分,灵活调配,以打击敌人。如果只懂得“合而不知分”,在该分兵的时候不分兵,就是自己束缚了自己,即使是拥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也会打败仗。它列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战例,指出:战国时期李牧之所以能以20万之众一举击破匈奴,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悦绾亦以优势兵力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击败冉魏国主冉闵,原因在于“其众虽多,而能为奇阵,以分击之也”,是正确实施了分兵击敌原则的结果;而

前赵末主刘曜洛阳之战为石勒所败,前秦主苻坚淝水之战大败于东晋,隋朝杨玄感叛乱兵败于潼关,“皆因其众结一大阵,不知分而为奇也”^{[6]126},都是将众多兵力猬集一处,不懂得分兵出奇制胜的缘故。

它通过考察研究古代战例进而分析指出:“古人大众之阵,有横互数里,或十数里,或数十里者。人众则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知。万一不利,辄相贻误,容易溃散。况将帅不专,分数不明者乎?则甲兵粮饷适足为敌资也。”^{[6]125}它认为,兵力过于集中,结阵过大过广,敌人进攻时各部队无法及时互通消息,相互援应,很容易造成混乱溃散。如果统兵的将领没有专断的职权,又不掌握部队的体制编制情况,那么最终的结局只会是全体将士连同器械物资都成为敌人的战利品。因此,统率大兵团作战,“固以分而不以聚”,应当适当分散兵力。不仅要在平常结营时,做到分兵屯驻要害,各部队之间确保能够“周悉联络”,以免号令难通,声势不接,“敌聚而攻,一营受敌,急应不能;一营既破,众营摇动”^{[6]126},更要在与敌交战时,采取分兵破敌的原则,将众多兵力区配置,灵活调度使用。《草庐经略》提出在“敌一而我十”、我众敌寡情况下,兵力分散使用及具体作战方法是:“以二为正兵,而以八为奇兵,或猎其左右,或冲其正中,或击其后阵,或断其援兵,或伏其奔路,或袭其营寨,而抄其辎重粮饷。其余屯据老营,以为家计;设伏阵后,以备不虞。而正兵以强弩劲弓火器坚阵以待,不必责以轻进,第使敌虽锐,无能冲入。俟我奇兵四合,敌必奔逃,然后正兵拔阵而追,务期殄灭”^{[6]125}。即将兵力区分为“正兵”“奇兵”和预备兵三部分,正兵负责正面迎击和牵制敌人,兵力不须多,占总兵力的二成即可;奇兵负责以奇制胜,灵活机动,多方破敌,这部分兵力占总兵力的八成左右,实则为主力。此外,还留出少量兵力负责守营和作为预备队使用,以应对不虞情况出现。正兵与奇兵各司其职,两相夹击,便能将敌人一举歼灭。

《草庐经略》还分析论述了“用寡”的情况,认为兵在精不在多,如果己方士兵确实精锐,将领既勇且智,即使兵力较敌人寡少,亦可以克敌制胜。它提出以寡击众的作战原则为:“宜险隘,宜

昏夜,宜短兵,宜致死,宜进退迅速,宜烦数变化,宜置阵坚固,宜撤备而不为自保之计。”^{[6]127}“宜险隘”,就是当敌人身处险隘之地,众多兵力难以展开时,适合以寡击众;“宜昏夜”,是因为在夜间,敌人难以测知我方兵力多寡虚实;“宜短兵”“宜致死”,士卒个个怀着必死之心深入敌阵,短兵相接与敌搏杀,则可以以一当百;“宜进退迅速”“宜烦数变化”,是因为兵力寡少,必须行动迅疾,不可久战,同时还要攻击方向及战术频繁多变,出其不意,使敌防不胜防;“宜置阵坚固”,是说必须确保己方阵形严密坚固,没有漏洞,不留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宜撤备而不为自保之计”,就是撤除一切防备,不给士卒留下后退自保的念想,从而全力向前杀敌,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将帅懂得并能利用好这几项原则,就可以使敌“前后不能相及,左右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保。则其阵必乱,其众必败,虽大敌不难破矣”^{[6]128}。

但是,《草庐经略》也指出,“用寡而胜”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除了自身将勇兵精,还应“审敌虚实”,了解掌握敌方的具体情况,“或侦其无备,或乘其饥疲,或敌众虽集,而众志成城,法令未齐,士情疑沮”^{[6]129}。如果通过侦察发现敌人防备松懈,或者饥饿疲惫,或者兵力虽然众多,但却内部不和谐,上下不团结,士气不高,有机可乘,这个时候才可以用己方寡少而精锐的兵力对敌发起攻击,才能获取胜利。

嘉靖时投笔从戎、万历时曾担任京营裨将、既善辞赋又娴将略的何良臣,在其所著兵书《阵纪》里也用专门篇章就众寡问题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众寡之势,莫以土地广大,兵马繁盛,就为众也。但分守处多,便无处不寡矣。”^{[7]706}土地广大、兵马强盛,并非就是“众”。如果分兵把守之处过多,则处处都是“寡”。善于用兵的将领,“能分合彼此之势”,即不仅能根据需要集中和分散己方的兵力,而且能调动敌方兵力相应地分散或集中,从而造成可乘之机。就己方而言,“用众”与“用寡”又各有一定的原则。指挥众多的兵力作战,其一般原则是“宜整宜治宜分”,应将部队严整组织或分散成若干部分,这样有利于在平坦开阔地带展开部署兵力,便于正面对敌防守和调动部队“进止抽移”。指挥数量较

少的兵力作战,其一般原则是“宜固宜轻宜锐”,首先必须确保己方士卒顽强、轻捷、精锐;其次要用于狭窄险隘的地段,避开平易宽广之地;最后还要“变化不厌烦数”,战术反复变化,令敌摸不清我进攻方向和行动路线。总之,“用众者,进而止之;用寡者,进而退之。所以识众寡之用者胜”^{[7]703}。兵力众多强大,要能做到能进能止,协调一致;兵力寡少弱小,要能做到能进能退,变化无常。懂得“用众”和“用寡”原则和方法的将领,才能够打胜仗。

何良臣还特地指出,使用小部队与敌大部队作战,一定要注意利用狭窄险隘的地形,尤其适合在日落黄昏时,埋伏于敌必经之路,或者偷袭和攻击敌虚弱之处,最好是选择在敌人“未舍半涉”即尚未扎营或渡河至一半时,发起攻击。如果不幸忽然遭到敌人的包围,“须乘其围势未坚,行列未定,急出武勇,挫其来气”^{[7]705},要趁敌人包围之势尚未形成,阵形尚未布好,迅速以勇锐之士出击,挫其士气。要像风暴突袭、雷电疾逐一样,收缩两翼,聚拢部队,集中兵力向敌猛攻,一旦敌阵势被冲垮,即使人数再多也会陷入混乱不治的局面。如果是以较少兵力进入敌境,被敌大部队团团包围,这时则应鼓舞士气,让士卒不要慌乱,静心待机,等到敌人防守稍微松懈时,从其兵力厚实但控制不严处一举突围而出。之所以选择兵力厚实但控制不严处,而不选择敌缺口处突围,是因为“大抵围师必阙,阙之前面,多有险伏”,而兵力厚实之处虽然是敌“根本地”,反而有隙可乘,不仅容易利用敌人的疏漏,从此打开缺口冲出,而且还可以趁机冲乱敌营,进而收到“一击而百万破矣”的奇效。

明人对于众寡分合思想的阐述中最全面最深刻的当属何汝宾。何汝宾出身将门,天启年间曾任广东总兵,自幼喜读兵书,钻研兵法,后来结合行伍切身体会,著成兵书《兵录》,对许多军事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谈到众寡分合问题时说:“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夫有分则有条理,有合则有联络。然分常患其疏,而合常防其混。故合而不分,分而不合,非善也;合而有分,分而有合,非善之善也;即分为合,即合为分,乃善之善也。且如领兵一千,分为三枝,每枝三百人,张犄角之势。常以一枝当敌,一

枝治力更番,一枝潜师隐处。当敌者为正兵,专司截杀;治力更番者为奇兵,专司接援;潜师隐处者为伏兵,专司冲突,出其不意。另以一百人分行哨探。如此分布,敌虽众,吾以寡击之,无不胜也。此即分为合,即合为分之说也。”^{[8]581}他认为,决定作战胜负的,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在于如何巧用兵力的集中与分散即“分合之变”。适当分散兵力,部队才能具有一定的条理,有利于行动灵便;适当集中兵力,部队才能彼此策应,有利于形成统一强大的力量。但是,兵力分散往往容易造成阵形疏散,兵力集中时也会出现阵势混乱的情况,因此对于将领来说,如何灵活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他看来,只有集中没有分散,或者只有分散而不集中,这是最差的;集中里面有分散,分散里面有集中,这也不算是最好的;能够迅速把分散变为集中,迅速把集中变为分散,也就是“即分为合,即合为分”,这才是最好的。

为了说明怎样做到“即分为合,即合为分”,何汝宾还以统兵训练及作战的实践经验,用士卒一千人为例详加阐释:一千人可以分为三支部队,每支三百人,一支作为正兵,正面迎敌,与敌拼杀;一支作为奇兵,养精蓄锐,准备随时投入援应;一支作为伏兵,趁敌不备,从敌虚弱处发起突袭。另外分出一百人作为侦察兵,负责哨探传报敌人动静虚实。这样,就能最合理快速地集中和分散兵力,最有效地运用和调度兵力,无论是以众击寡,还是以寡击众,都能取得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明代在边防上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作战方式与特点也以防御为主,因此明人在论述众寡分合问题时,往往还将之与边防兵力的部署联系在一起。如弘治时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言边事,批评当时边防兵力部署的弊端在于处处分兵设防,而敌骑“云散鸟集,备西则击东,备东则击西”,其所攻方向专一,故而明军虽然集中兵力在一个方向上进行防守,却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反倒显得兵力不够。他认为,“善用兵者以多为少”,因此主张将边军分而为三,或分为五部分,严加训练。敌骑来进犯,“以一军当其前,一军出其后,又以一军冲其中坚,又以一军袭其老家”^{[9]280},这样我方进攻方向和目标专一,敌人则变为需要处处防守,自然不用担

心不能取胜。嘉靖时任蓟辽总督的刘焘也认为,依靠长城被动防守,容易造成兵力分散,“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皆兵家所忌,恐非清塞之策”,“以防零寇可也,恃之以御大举不可也”^{[10]3210-3211}。他指出,这种依托边墙分散兵力处处设防的做法,“地远而兵微,应援而难至,当仓卒应变之时,而取救于千里之外,急之则人马疲劳不能行,缓之则延捱道路而不得用”,一旦一处失守,其余各处防守亦将随之动摇瓦解。因此,他主张与其徒劳无益地反复修筑边墙,分散兵力消极把守口隘,不如训练士卒,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这样不仅使防守得以强化坚固,而且可以通过“合战”之力,重创进犯之敌。

王鏊、刘焘等人关于“众寡分合”的议论,虽侧重于从边防战略的角度来阐述如何进行兵力部署,但主要思想却与战术上的“分合之变”和“众寡之用”基本原则相一致,是结合时代具体情况对其的进一步发挥。

三、“众寡分合”思想在明代的实战应用

明人对“众寡分合”思想除了在理论上进行阐发,还付诸军事斗争的实践。作为文武兼备的军事将领,戚继光、俞大猷、沈希仪等人既深谙“众寡分合”理论,又拥有在实战中予以践行运用的能力与条件。

戚继光用兵作战,一向奉行“我专而敌分”、集中优势兵力大创尽歼的原则,将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他通过分析敌我强弱优劣,认为“倭奴鸷悍技精,须用素练节制劲兵,以五当一,始为万全”^{[11]3},因此主张集中兵力作战,“以五当一”,确保战前己方对倭寇形成“以众击寡”的绝对优势。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则不轻易开战。戚继光抗倭作战的几次大捷,多是在总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却在局部地区或某一作战方向集中兵力形成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如台州之战的花街战斗,戚家军以2000人击溃倭寇500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4。上峰岭战斗,虽然戚家军总兵力为1300人左右,倭寇为2000余人,敌众我寡,但戚继光集中全部兵力,利用崎岖的山路地形巧妙设伏,放过倭寇最强悍精锐的前锋和殿后部分,攻其最为薄弱的中部,使已在局部战斗中的兵力仍然占据

优势。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的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之战,戚继光联合俞大猷、刘显军,总兵力更是达到敌人的十倍,由此确立了“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奠定了速胜歼敌的基础。

为了达到以己众击敌寡的目的,戚继光在实战中往往通过改造战场环境,采取迷惑、调动倭寇的方式,来分散其兵力,主动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使优势的天平向己方倾斜。嘉靖四十二年冬的仙游保卫战,就是这一战术的生动体现。当时倭寇有 1 万余人围攻仙游,而戚继光留守福建的兵力只有 6000 余人,同倭寇相比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没有贸然同敌交战,而是调胡守仁部据险设垒,与倭寇对峙,并选派精兵进城,加强仙游城的防守,不时做出进攻的姿态,对倭寇进行骚扰,以此牵制倭寇,动摇其攻城的决心,尽量拖延倭寇的进攻时间。同时积极同浙江方面协调调兵增援,待浙江援兵到达,总兵力与敌差距缩小后,戚继光才转守为攻。在进攻时,戚继光针对倭寇列营四门、兵力分散的情势,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攻击南门大营的倭寇,依次再攻东、西、北门倭营,很快便将围困仙游城的四座倭营全部焚毁,不仅顺利解围仙游,而且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虽然从整体上看仍属于“用寡击众”,但戚继光先是通过适当分散一部分兵力来引诱调动倭寇,使其难以集中,而后又集中己方兵力对分散之敌各个击破,可谓是示形动敌,巧妙灵活运用“我专而敌分”、集中兵力作战原则的典范。

在镇戍北方任蓟镇总兵期间,戚继光针对辖区内防线绵亘 2000 余里,如果处处设防,必定导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11]51} 的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实行“酌量缓急,分别冲僻”^{[11]123} 的防守原则与策略。将兵力收缩集中于敌人“必攻必出”的要冲之处,而不甚紧要的偏僻处,则只保留瞭望哨探,不再分兵把守。同时将边墙内驻军整合为东、西、中三个防区,分别由自己和蓟辽总督、顺天巡抚统领,使得兵力相对厚实集中,可以随时根据情况,或在敌人进攻边墙、守军不支时,予以机动增援;或在敌人突入边墙后,予以阻击截杀。隆庆二年(1568)末,蒙古朵颜部酋长董狐狸与其侄长昂纠集部众,准备自青山口(今河北迁西东北)等处内犯。戚继光闻讯后亲自率兵前

往援应,于除夕夜驰至青山口,用礮石、弓矢和火器将敌击退,并追击至口外,大获全胜。万历年(1573),蒙古朵颜、土蛮部接连进犯孛子谷(今河北秦皇岛抚宁东北)、界岭口(今抚宁北)、窟窿台(今抚宁东北)等处边墙,均被戚继光及时督率官兵拒堵打退,董狐狸几乎被活捉。万历三年(1575)初,长昂与其弟长秃率众攻董家口(今迁西东北)关城。戚继光督军将敌击退,继而出关一百五十里追击,生擒长秃。由于戚继光的重点设防和快速集中调度兵力机动作战守边策略的成功施行,董狐狸、长昂在内犯屡受打击、损失甚重之后,表示愿意归附效顺明廷,接受封赏,从此永不再犯边。

与戚继光并称于世的明代另一军事家俞大猷,也善于在实战中灵活使用集中兵力原则。俞大猷用兵素以“沉机持重”^{[12]2016},务求“收万全之功”^{[13]305} 而著称。每次作战,必待“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13]175},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十围五攻之威”“太山压卵之势”^{[13]298},方才展开行动。嘉靖四十二年(1563)初,倭寇占据平海卫,俞大猷奉命与广东总兵刘显率军攻剿。时倭寇兵力约 3000 人,加上依附倭寇的海盗武装共万余人,俞、刘二部兵共计亦有万余,虽兵力大致相当,但俞大猷认为尚不足以胜敌,于是一面与刘显军列营树栅,掘沟筑垒,对倭寇实施围困,防止其逃窜;一面呈书福建巡抚谭纶,请求调发戚继光军入闽增援,以对敌形成绝对优势,从而将平海卫之倭一鼓荡平。四月,戚继光率所部万余人赶至平海卫,明军总兵力达到 3 万。倭寇闻戚继光兵至,惊恐之下欲从海路遁逃,遭到明水军截击后又返回平海卫,以 3000 人移驻平海卫咽喉之地许厝村,据险结巢,负隅顽抗。在重兵集结、取得对敌绝对优势后,俞大猷与戚继光、刘显随即督率军队分成三路,由戚家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刘显军负责左右包抄,向许厝村倭寇发起攻击。明军用火器开路,并且乘风纵火焚烧倭营,犹如摧枯拉朽一般,仅用四五个小时,即将许厝村倭寇全部歼灭,胜利收复了平海卫。

平海卫大捷后,俞大猷移师广东,进剿扰掠潮州一带的倭寇。当时潮州新旧倭寇共有 2 万人,尤其是从日本新近才来入侵的倭寇,十分剽悍善战。此外还有当地海盗吴平部约万人,勾结

倭寇为乱,助长其气焰。俞大猷深知敌众我寡,唯有设法分散敌兵力,使倭寇与吴平部不能合兵,才能专力消灭倭寇。为此,他首先派人招抚吴平,使其暂时不再与倭寇相来往,剪断倭寇羽翼和帮凶,将之孤立起来;之后申请上司,四处调集军队,以增加己方兵力。先后调来福建兵1.5万人及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兵(狼土兵)约万余人,并调广州水师屯驻柘林港(今广东饶平东南),封住倭寇从海上逃窜之路。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月至六月,俞大猷督率聚集而至的各路明军,向邹塘(今广东揭阳揭东东南)、金锡都(今广东海丰东南)等地的倭寇发起进攻,灵活运用多种战法,先歼敌一部,再逐个击破,最终将倭寇几乎全歼,成功肃清了广东的倭患。

嘉靖末、隆庆初年,俞大猷受命先后征讨反叛朝廷的广东河源、翁源地区“山寇”和广西古田(今广西永福)僮(壮)民。面对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战斗力较弱的农民武装,俞大猷亦不轻敌,仍坚持“十指分凿,不如合拳独击”^{[13]331}的集中兵力原则,主张调集重兵予以围剿。两次用兵,他都征调了十万兵力。但在征剿过程中,他又能视情灵活分散兵力,将大军分为数路,或正面进攻,或侧翼包抄,或佯动感敌,或设伏堵截。同时严令各路必须统一协调行动,确保能够同时对敌发起攻击,以求一举全歼。在俞大猷的正确指挥下,明朝官军深入崇山峻岭,分进合击,攻营拔寨,均只用了数月时间,即将广东二源“山寇”和广西古田僮民叛乱彻底平定,一劳永逸解决了困扰明廷多年的棘手问题。

正德、嘉靖年间的名将沈希仪则是善于以寡击众的代表。正德末年(1521),广西永安(今蒙山)、临桂、荔浦等地瑶民反叛朝廷,攻围城邑,四出劫掠,时任广西都指挥佥事的沈希仪奉命督率官兵进剿。他鉴于当地山险林密,地形复杂,朝

廷大军又一时难于毕集,现有兵力不敷使用的情状,经常只以麾下数百人击敌。一次,“荔浦贼八千渡江东掠,希仪率五百人驻白面寨,待其归”^{[14]5591}。白面寨位于桂江边,距离蛟龙、滑石二滩各有数里。沈希仪经过实地侦察,认为滑石滩狭窄,只能“牵线而济”,即使敌人众多仍可进击,而蛟龙滩则地势较为开阔宽广,敌人可以“成列而济”^{[6]129},其兵力不分散,则难于围歼,因此决定将敌引诱至滑石滩而歼之。他于是命人在江岸伐竹为竿,编篾为旗,树立数百于蛟龙滩,留数十名羸卒看守,并燃烧柴火来迷惑敌人。敌人抢掠后返至江边,见蛟龙滩烟起,疑有伏兵,遂蜂拥转向滑石滩渡江。沈希仪预先分兵埋伏于滑石滩两岸,又用小船载善战劲卒,悄悄伏于江中芦苇之中。等到敌人渡至一半,江中伏兵乘船顺急流冲击,岸上伏兵亦鼓噪上前夹攻。敌众大乱,后渡者多拥挤坠入水中淹死,前渡者则尽数为明军俘虏。此战,沈希仪利用地形特点,不仅巧妙分散了敌方兵力,更在己方兵力处于劣势的境况下大胆分兵,最终成功破敌,可以说是真正领略和掌握了分合之变、众寡之用思想的精髓。

从根本上来说,明人对“众寡分合”问题的探讨,并未突破以往的理论框架与范畴,但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却大大超越了前人。何良臣、何汝宾等兵家明辨相关概念,对“众寡分合”的具体原则、标准及灵活施用等方面的论述十分详尽全面,有的见解非常精辟深刻,甚而为前人所未发。戚继光、俞大猷等军事将领还将自己对“众寡分合”的理解运用于实战,克敌制胜,从而赋予其可贵的实践价值。明人在“众寡分合”问题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可谓均卓有建树,对于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孙武. 孙子兵法[M]//中国兵书集成:1.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2]司马法[M]//中国兵书集成:1.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3]刘安. 淮南子[M]//中国兵书集成:2.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 [4]何去非. 何博士备论[M]//中国兵书集成:6.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 [5]张文才. 百战奇法浅说[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6]崔统华. 草庐经略注译[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 [7]何良臣. 阵纪[M]//中国兵书集成:25.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8]何汝宾. 兵录[M]//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9.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9]王鏊. 王鏊集[M]. 吴建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10]陈子龙,等. 明经世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1]戚继光. 戚少保奏议[M]. 张德信,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2]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 [13]俞大猷. 正气堂全集[M]. 范中义,点校.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 [14]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Oper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ore or Less Troops with Proper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Ming Dynasty

GE Ye-wen

(Warfare Studies Department,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More or less troops with proper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refers to the issue of the use and deployment of military forces. It is a fundamental issue in warfare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e Ming people made a more in-depth and detailed study of this issue. Military generals represented by Qi Jiguang and Yu Dayou vividly explained the change of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ctual combat and the use of “more or less troops”, which further enriched and developed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s o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Keywords: Ming Dynasty; more or less;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troops; fight;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责任编辑:许 金)